

电信诈骗的风险治理：日本经验的中国镜鉴

侯迎迎 吕若水 褚茗洋

(南开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 300071)

摘要: 本研究揭示了 2019-2024 年日本特殊诈骗犯罪呈现‘技术驱动扩散、弱势群体聚焦、国际化犯罪网络形成’的三角演变模式。研究发现, 日本特殊诈骗犯罪规模持续扩张, 日均被害金额显著攀升, 新型技术手段如弹窗诈骗和跨境汇款诈骗占比大幅增加。老年群体, 特别是老年女性, 仍是主要受害群体。犯罪网络结构复杂, 境内青少年、跨国中介及暴力团伙分别扮演不同角色。面对诈骗手段快速迭代、防控体系碎片化、社会脆弱性突出的挑战, 开展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日本治理经验为基础, 系统梳理其演变逻辑与防控路径, 旨在为中国电信诈骗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特殊诈骗; 日本电信诈骗治理; 数字化反诈技术; 跨国犯罪网络; 国际执法协作

中图分类号: H3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特殊诈骗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形态, 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社会治理难题。数据显示, 2020 年至 2024 年间, 日本特殊诈骗案件数从 13,550 件攀升至 21043 件, 被害金额从 258.2 亿日元激增至 718.8 亿日元, 日均被害金额从 7,790 万日元上升至 9639 万日元。这一犯罪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严重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

从犯罪特征来看, 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 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 暴力团参与度维持在 13.6%-19.1%之间, 青少年参与比例达 18.2%-21.6%, 外国人参与度为 4.7%-5.9%。其次, 犯罪手法从传统的“儿子女儿类诈骗”向“假冒公职人员诈骗”转变, 电子支付诈骗、退款诈骗等新型诈骗方式不断涌现。再次, 从区域分布来看, 犯罪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圈, 2024 年以东京(3494 件)、大阪(2,644 件)、神奈川(1999 件)为代表的七大都府县案发总数占全国总量的 64.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65 岁以上老年人群是主要受害群体, 其被害案件占企业以外总案件的 65.4%, 其中老年女性更是重灾区, 占比高达 44.1%。

针对特殊诈骗, 日本政府采取了多层次的应对措施。在法律层面, 通过完善《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银行转账欺诈救济法》等法律制度, 构建起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在执法层面, 成立了跨部门协作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打击。在预防层面, 建立了预警机制, 推进警企合作, 开展社会宣传教育。然而, 从实际效果看, 这些措施的防控成效仍有待提升。

目前, 学术界对特殊诈骗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特征分析、防控措施评估等方面。然而,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缺乏对最新犯罪形态的系统分析, 特别是对 2019 年后新出现的诈骗手段研究不足; 二是对防控体系的整体性研究较少, 尤其是对新型治理模式的探讨不够深入; 三是跨国比较研究视角有限, 对日本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借鉴研究相对匮乏。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犯罪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采用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 2019-2024 年日本警察厅发布的特殊诈骗犯罪统计数据为基础，系统考察日本特殊诈骗犯罪的演变特征与防控体系。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时间跨度新，涵盖 2019-2024 年最新数据；二是分析视角新，从犯罪治理体系优化的角度展开研究；三是数据支撑新，首次系统整理并分析了日本近五年特殊诈骗预防和打击的实证数据；四是研究方法新，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对于深化特殊诈骗防控理论研究，完善防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日本特殊诈骗犯罪的演变与剖析

近年来，日本特殊诈骗犯罪呈现出复杂且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在规模、空间分布、技术运用等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背后亦潜藏着深刻的社会脆弱性因素。深入剖析这一现象，对理解日本犯罪态势及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1 规模 - 空间 - 技术三重演进

2019 - 2024 年期间，日本特殊诈骗犯罪在规模、空间与技术层面发生了深刻变革。本节将围绕这三方面展开分析：规模扩张方面，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在短短数年间实现爆炸式增长，打破了既有的犯罪增长态势；空间扩散上，案件分布虽依然呈现大都市圈的高度集聚，但已出现由核心区域向地方蔓延的明显趋势；技术升级维度，诈骗手段从传统电话话术迅速迭代至网络化、智能化，利用社交平台、AI 伪造以及加密通信工具，显著提升了隐蔽性与跨境性。这一系列演进不仅重塑了诈骗犯罪的形态，也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1.1 规模扩张：案件激增与金额攀升

2019 年至 2024 年，日本特殊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均呈现爆炸式增长。2023 年，日本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达 163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81 亿元），较 2022 年翻倍¹。2024 年仅第一季度，社交网络投资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已超 219.3 亿日元，是 2023 年同期的 7 倍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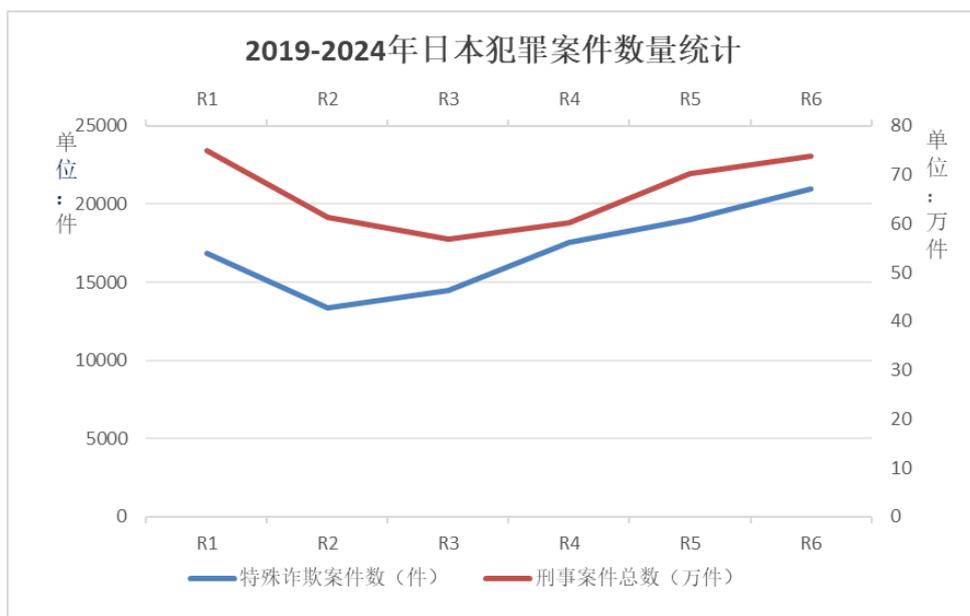
相较过往年份，2019 - 2024 年间日本特殊诈骗犯罪案件年增速最高达 21.2%，近年维持在 10%左右，远超同期日本整体犯罪最高 5.8%的增速，全然打破了以往的犯罪增长态势。通过非线性增长模型开展非线性回归分析，高度拟合结果显示，该时段特殊诈骗犯罪案件增速符合三次函数曲线，虽然一度有所下降但近年又有上升趋势，高度拟合的数据直观反映出

¹ 朱玥颖：《日本网络犯罪事件增多》人民日报 2024 年 8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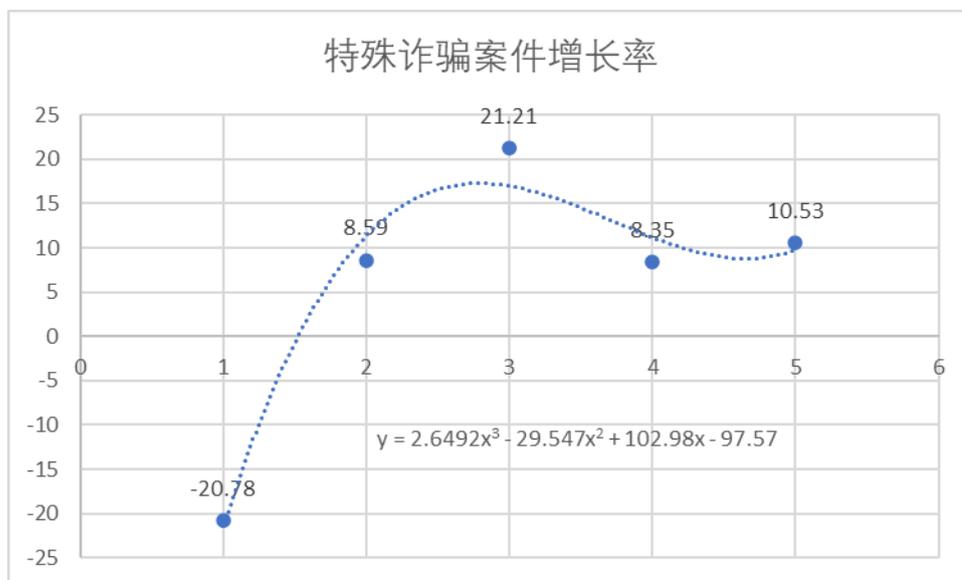
² 新浪财经，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zqgd/2024-05-20/doc-inavxaph7568406.shtml><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zqgd/2024-05-20/doc-inavxaph7568406.shtml>[2025-07-23]

防控缺口正加速特殊诈骗犯罪蔓延。



| | 特殊詐欺案件数 (单位: 件) | 刑事案件总数 (单位: 万件) |
|-----------------|-----------------|-----------------|
| R1 ⁴ | 16851 | 74.9 |
| R2 | 13350 | 61.4 |
| R3 | 14498 | 56.8 |
| R4 | 17570 | 60.1 |
| R5 | 19038 | 70.3 |
| R6 | 21043 | 73.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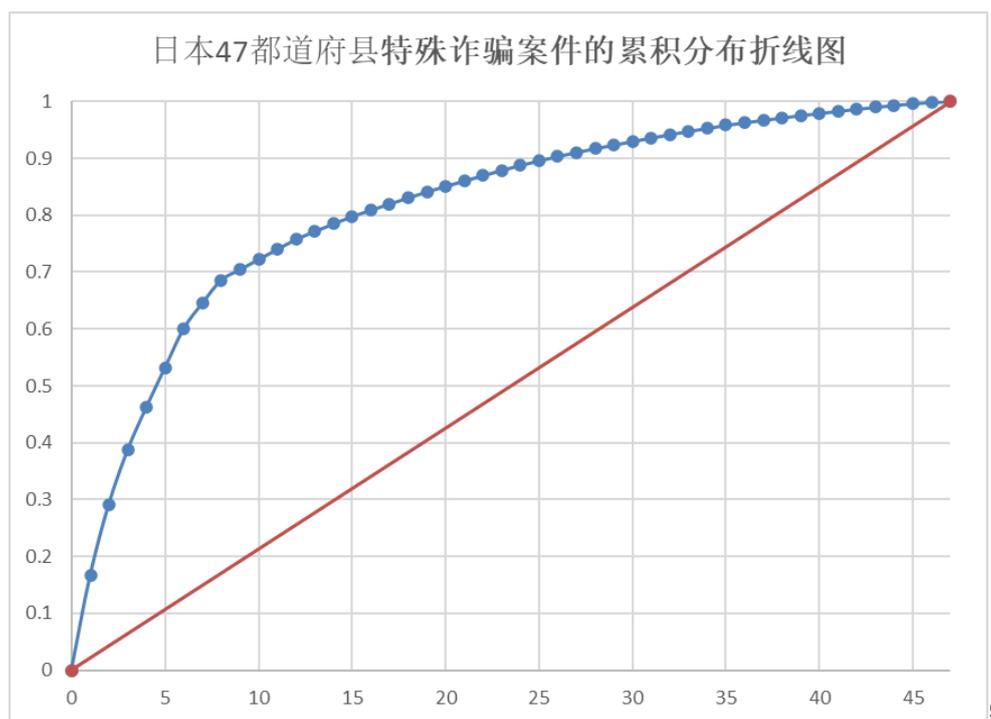
³ 数据来源: 「令和6年における特殊詐欺及びSNS型投資・ロマンス詐欺の認知・検挙状況等について(確定値版)」、「令和6年の犯罪情勢」

⁴ R表示令和(れいわ), 如R1是令和1年

2.1.2 空间扩散：从核心城市向地方蔓延

从案件的空间分布来看，日本特殊诈骗案件呈现出显著的核心集聚特征。从案件发生密度看，东京与大阪不仅在绝对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在相对指标上也表现出高度集中。2024年，东京和大阪合计占全国案件总数的近30%，按人口折算，每10万人案件数分别达到约24.96件和30.05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6件/10万人），显示出大都市圈在诈骗风险上的极端集中性。这一格局的产生源于大城市人口密度、经济活跃度及信息流程程度的高度集中，体现了诈骗行为对大城市特有社会结构的依赖。

进一步观察空间格局，诈骗活动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扩散特征。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和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圈，周边都府县（神奈川、埼玉、千葉、兵庫）同样表现出案件数量的高值，与爱知县合计形成前七大都道府县，占据全国案件总量约70.4%（CR7），说明犯罪活动高度集中于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群。这种集中性在累积分布曲线上表现尤为突出，前七个都道府县的曲线急剧上升，而其余40个地区趋于平缓，表明案件分布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结合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0.083$ ，显著高于均衡值0.021）与基尼系数（约0.52），可进一步印证诈骗案件在空间结构上的高度集聚。



在岩手县等传统低发案地区，诈骗案件数量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单案平均损失额却呈现惊人反差——岩手县高达1,843万日元的均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44万日元）的42倍。这一悬殊差距暴露出地方社会在防范意识、信息传播及大额资金监管方面的系统性薄弱环节。

⁵ 数据来源：警察厅「警察厅·SOS47 特殊詐欺対策ペー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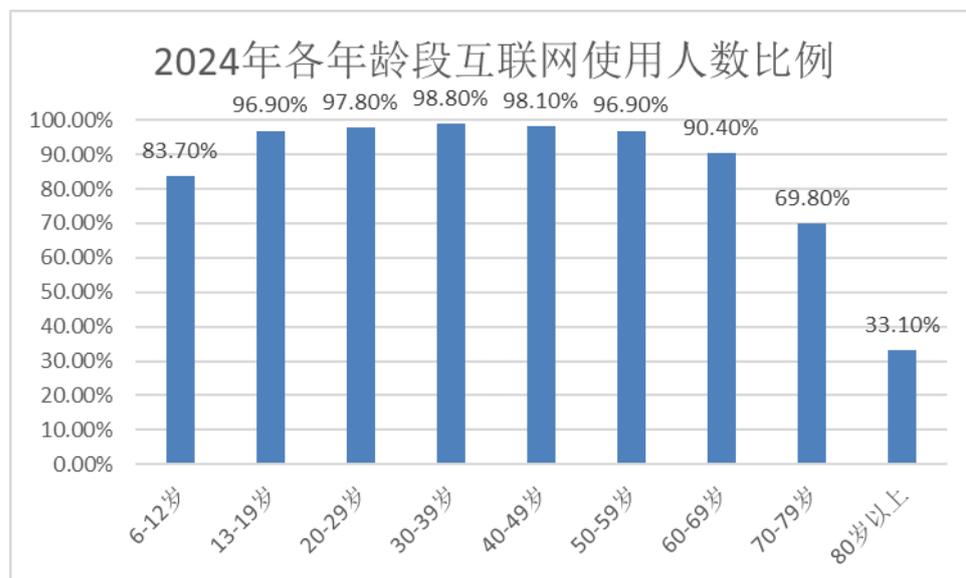
2.1.3 技术升级：从传统话术到网络化犯罪

此外，技术层面亦持续嬗变。总体来看，2019-2024 年期间，日本诈骗犯罪的技术手段持续迭代升级。诈骗手段从早期“是我是我”（オレオレ詐欺）电话诈骗向社交媒体与 AI 技术结合的方向演变。2024 年，假冒名人或机构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占比激增，例如诈骗分子盗用名人照片建立虚假投资群，诱导受害者向个人账户转账，此类案件 2023 年增长近 10 倍，单笔最高损失达 1.7 亿日元（约 785 万元人民币）⁶。同时，还有犯罪组织利用加密通信工具（如 Telegram）和比特币洗钱，形成跨国化、链条化运作，犯罪隐蔽性增强加大了警方的治理难度。

2.2 社会脆弱性解剖

尽管技术层面的防控手段不断升级，诈骗信息的识别与拦截效率有所提升，但社会结构中持续存在的“脆弱环节”依然为电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在高度老龄化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深入剖析特定群体在制度安排与日常生活中的脆弱性，对于识别诈骗高风险群体、构建差异化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节从社会脆弱性视角切入，尝试揭示特定群体易受害的制度性与结构性根源。这不仅为防骗教育和制度干预提供了实证基础，也提示我们需将反诈治理重心从技术防线外延至社会支持系统的深层修复，形成更加具备韧性的综合防控体系。

2.2.1 代际数字鸿沟与老龄化困境



日本存在明显的代际数字断层现象，高龄群体不仅上网率明显低于中青年人群，在网络用途、设备使用、信息安全意识等方面也表现出“滞后”特点。根据 2024 年总务省调查数

⁶ 人民网，<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4/0605/c35421-40251169.html>[2025-07-23]

⁷ 数据来源：総務省「令和6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査の結果」

据，13岁至69岁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普遍高于90%，其中20~59岁各年龄段的使用率接近或超过95%。然而，进入老年阶段后，该比例出现明显下滑。60~69岁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为90.4%，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在70~79岁迅速降至69.8%，80岁以上更是骤降至33.1%。这一趋势反映出：随着年龄增长，接触并持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呈现断崖式下降，且50岁以上各年龄层使用互联网的首要目的是电子邮件收发等传统用途，尤其在面对依赖电子支付、SNS和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的新颖电信诈骗时，老年群体更容易成为目标，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与判断力。

2024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受害报案数为13707件，在剔除法人受害案件后，在总报案数中占比为65.4%，尽管这一比例相较2023年有所下降，但老年人仍然是电信诈骗受害的主要群体。除此之外，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体力和判断力逐渐衰退，再加上丰富的阅历容易使其过度依赖自身经验，陷入过度自信的心理误区；在面对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时，往往难以识破骗局，即便有所察觉，也很难有效应对。2024年3月，日本黄金零售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这一“黄金热”被诈骗分子利用为作案噱头。他们借日元贬值引发的恐慌心理，冒充投资顾问或相关机构，以“投资黄金更安全”为幌子骗取老年人资金。自2024年6月起，日本各地（包括爱知县、东京、大阪、京都、静冈）频发针对老年人的黄金条诈骗案件，受害人损失金额从800万日元到1亿日元不等⁸，凸显其在金融安全领域的脆弱性。

2.2.2 独居与情感缺失催生“孤独经济”

独居老人数量的增加也催生了“孤独经济”。独居老人长期缺乏情感交流，心理上渴望外界联系，这使得他们在接到诈骗电话时，更易放松警惕，接到诈骗来电的频率更高，且更可能愿意听完整通话，给诈骗者创造信任的心理空间，从而使诈骗更容易得逞。2021年犯罪白皮书中显示，在65岁以上的老年受害者中，约1/3为独居老人，另有三成仅与配偶同住者，孤独状态成为他们陷入诈骗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部分受害者甚至因渴望情感联系而陷入“浪漫投资”骗局，最终人财两空。

2.2.3 医疗信息泄露与性别风险差异

在老龄群体中，女性因其社会角色和健康行为模式，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健康关注意识和较高的就医频率。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随着年龄增长，无论男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比例均下降，而“状况不佳”的比例上升，但这种趋势在女性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说明老年女性不仅更容易感知健康问题，也更倾向于采取医疗干预以维持健康状态。这一行为特征导致老年女性在人均医疗服务利用率上显著高于男性，其个人健康相关信息在医疗系统中的生成与流通频率也更高。医疗信息因其涉及个人健康状况与隐私，天然属于高度敏感的数据

⁸ The Japan time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08/26/japan/crime-legal/gold-bar-fraud/>[2025-08-10]

据类型，而在数据安全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其泄露风险进一步加剧。一旦医疗信息外泄，不法分子可基于其中的身份与健康细节，实施诸如“健康保险退款”“虚假就诊调查”或“医疗账户冻结”等高度针对性且欺骗性强的诈骗行为，对受害群体造成较大经济与心理冲击。

在信息接触路径上，医疗系统中泄露的姓名、出生年月、联系方式及就诊历史等资料，为诈骗者提供了个性化话术定制的基础，显著提高诱骗成功率。统计显示，在特殊诈骗（特殊诈骗）受害者中，老年女性占比长期居高，受骗概率约为同龄男性的 1.7 倍。该现象并非由单一行为变量造成，而是健康意识、信息暴露路径与性别特有的心理机制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医疗信息泄露不仅增加了老年女性成为诈骗目标的可能性，更使诈骗手法呈现出更强的精准化与个性化，从而加剧其面临的风险。

三、日本特殊诈骗犯罪防控体系评析

3.1 针对犯罪手法演变的防控策略评析

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电话诈骗在各类诈骗犯罪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有所遏制，其占比仍接近八成（令和 2 年 86.9%、令和 3 年 88.9%、令和 4 年 86.3%、令和 5 年 77.5%），远高于弹窗诈骗、邮件或短信诈骗、明信片诈骗等其他类型。

其中，“050”开头的电话号码由于获取便捷、通话费用低廉、注册无需实名验证，且不易被定位或识别，常被用于推销骚扰及电信诈骗活动⁹。为遏制此类行为，日本推行固定电话号码停用和国际来电拦截措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例如，NTT DOCOMO 为用户提供免费“迷惑電話ストップサービス”（骚扰电话拦截服务）¹⁰；此外，亦有多种第三方软件提供垃圾信息过滤与来电拦截功能。然而，随着诈骗技术持续演化，此类手段的防护能力仍存在局限。尽管停用固定号码与拦截境外来电在一定程度上切断诈骗链条，但由于诈骗号码频繁更换，仍难以实现全面阻断。

除电话诈骗外，邮件诈骗与近年兴起的弹窗诈骗亦日趋严重，对执法打击带来新挑战，包括网络钓鱼、虚假邮件、欺诈网站等形式。当前防控体系依赖于警企协作对非法访问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并持续优化垃圾邮件过滤与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尽管现有手段已具备一定防控效果，但仍存在可被利用的漏洞。诈骗分子通过伪造域名、内容定制化及动态调整传播策略等手段不断挑战识别机制。例如，近期日本大阪世博会期间出现的伪造官网诈骗案件，就反映出犯罪分子善于借助重大公众事件实施高欺骗性攻击¹¹。这一现象凸显出技术防御机制需保持持续迭代，以与不断演进的犯罪手段同步升级。

在技术防控之外，提升公众防骗意识仍是最根本的预防手段。日本政府与警方在宣传策

⁹ 朝日新闻、<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CK7H9BPCKTIPE013.html>[2025-07-23]

¹⁰ DOCOMO,

https://www.docomo.ne.jp/binary/pdf/internet/hikari/tell_service/support/notice_08.pdf[2025-07-24]

¹¹ The Mainichi,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40321/p2a/00m/0na/003000c>[2025-07-24]

略上注重因类施策。如警察厅设立专题网站，系统发布各类特殊诈骗手法及应对措施¹²；各地方政府同步开展线下宣传活动。例如，千叶县推出“STOP! 電話 de 詐欺”专项活动，呼吁居民避免与诈骗分子直接通话，鼓励设置语音留言识别异常来电¹³。移动通信运营商也通过短信提醒用户注意防骗。针对 SNS 诈骗、钓鱼链接等形式，相关应用程序和网站则通过弹窗提示，引导用户保护个人信息并警惕可疑链接。

3.2 针对区域分布特征的防控力量配置评析

根据日本警察厅统计，诈骗案件在地理分布上呈现高度集中态势，主要集中于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埼玉、千叶及兵库等七个都府县，反映出显著的大都市圈聚集性特征。其成因在于大城市人口密集、经济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复杂，诈骗分子因此更易获取潜在目标。此外，大都市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完备，网络覆盖广泛，亦为犯罪分子通过电话与互联网实施诈骗提供便利条件。

为加强对重点区域的打击力度，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特殊詐欺「連合捜査班」(TAIT)”¹⁴，统筹地方警力，专门查处电信诈骗等组织犯罪行为。其中，在上述七个都府县警察厅组建了约 500 人的专职队伍，与地方警察密切配合，重点打击匿名流动型诈骗集团。警察厅同时要求各地加强专业化人员培训，提升在应对新型诈骗中的实战能力。以东京警视厅为例，其通过“特殊詐欺根絶行动计划・东京（「特殊詐欺根絶アクションプログラム・東京」）”等项目，强化资源配置并推动企业与社会团体广泛参与反诈行动¹⁶。

相比之下，其他非都市区域诈骗案件占比较低，但因地广人稀、监管资源相对薄弱，诈骗活动呈现更高的分散性与隐蔽性。对此，日本正全面推动宣传与防范工作，尤其聚焦高发与重点地区，同时向其他区域逐步拓展。通过杂志、传单、电视广播等媒介展开高频宣传，并根据不同易受害群体（如老年人、妇女、青少年）制定多样化传播策略，例如在学校开展互动活动、发放反诈小礼品等¹⁷。然而，从整体执行情况来看，此类宣传措施仍集中在部分地区，尚未实现全国范围的均衡覆盖。此外，尽管针对网络诈骗的防控取得一定成效，但对于缺乏数字素养的老年人群体，仍需设计更具可达性与易理解性的宣传方式。

除宣传措施外，各都道府县间的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机制亦在逐步强化。尤其在诈骗高发区域，跨区域协作已显现成效。警察厅正加大对地方警察机构的业务指导力度，推动信息

¹² 警察庁・SOS47 特殊詐欺対策ページ、<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2025-07-24]

¹³ 千葉県、<https://www.pref.chiba.lg.jp/seikouan/bouhan/anzen/stop-ddsagi.html>[2025-07-24]

¹⁴ Biz clip、<https://business.ntt-west.co.jp/bizclip/articles/bcl00154-047.html>[2025-07-24]

¹⁵ TBS news、<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891533/>[2025-07-24]

¹⁶ 警視庁特殊詐欺対策本部、<https://action.digipolice.jp/actionprogram>[2025-07-24]

¹⁷ 岩手県警察「広報啓発活動の紹介」、<https://www.pref.iwate.jp/kenkei/anzen/sagi/3001952.html>[2025-07-24]

¹⁸ OHK 岡山放送 <https://www.ohk.co.jp/data/26-20240820-00000008/pages/>[2025-07-24]

集中处理与行动联动流程的简化,以提升整体响应效率。为进一步增强侦查能力,一些县级警察局已计划在打击电信诈骗相关部门内设立专责机构,并建设专门的调查受理系统,以构建高效统一的应对体系。

3.3 针对犯罪主体的精准打击措施评析

在日本特殊诈骗治理体系中,针对不同行为主体的精准打击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向。随着诈骗犯罪不断演化,暴力团体的渗透、青少年参与犯罪的增加以及跨国犯罪网络的扩展,对执法机构提出更高要求。为应对上述挑战,日本警方在打击暴力团经济链、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治、以及跨境执法协作等方面均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策略。下面将分别从暴力团主导犯罪、犯罪主体年轻化、以及外国人参与跨国犯罪三个维度,分析日本在特殊诈骗治理中的多元应对机制与实践经验。

3.3.1 针对暴力团伙操控的犯罪的打击

大规模诈骗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在日本多由暴力团体与黑帮组织操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与隐蔽性,且通常伴随复杂的利益网络。从逮捕数据来看,因诈骗罪被捕的暴力团成员占其总逮捕人数的比例常年维持在约10%。欺诈性筹款已成为暴力团体获取资金的常规手段,尤其近年来,其成员在特殊诈骗活动中频繁担任主导角色,并以此作为主要资金来源。

对此,日本警察厅在打击暴力团犯罪方面采取多维度措施,不仅针对其直接实施的违法行为,也延伸至其经济来源、企业勾结、网络犯罪等领域。警察机关通过广泛调查与查处暴力团涉足的金融犯罪、特殊诈骗及非法风俗业活动等,持续压缩其运作空间,重点打击其非法资金链条,以削弱其经济基础与再犯能力。

伴随犯罪活动的国际化趋势,警察厅也积极加强跨国执法合作。通过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协作,警察机关对涉及外国人背景的跨境犯罪展开专项打击,重点查处柬埔寨、越南等国犯罪集团与日本暴力团之间的勾连行为。此外,立法层面亦不断完善暴力团治理体系,相继制定并修订《暴力团对策法(暴力团对策法,暴力団員による不当な行為の防止等に関する法律)》《组织犯罪处罚法(組織犯罪処罰法,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益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枪炮刀剑类持有管制法》(銃砲刀剣類所持等取締法)等法律,为遏制其跨领域犯罪提供法律依据。

在组织架构打击方面,警察厅着重取缔以六代目山口组、神户山口组为代表的核心组织,通过削弱其人力资源与组织结构,断裂其对下层犯罪网络的控制。同时,加强对暴力团与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体之间勾结行为的打击,力求切断其利益链与合作体系。然而,暴力团日趋呈现分散化、隐蔽化与网络化态势,加之网络犯罪形式的复杂性,完全斩断其组织体系与资金链仍面临较大挑战。

3.3.2 针对犯罪分子年轻化的打击

近年来，日本电信诈骗等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为防范青少年卷入违法行为，政府及相关团体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旨在提升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与道德判断能力，增强其识别与抵御犯罪诱导的能力。每年暑假所在的7月被设定为“全国青少年受害和预防犯罪重点月（青少年の被害・非行防止全国強調月間）”，通过学校教育体系及互联网等青少年常用媒介广泛传播相关法律知识与防骗信息。

针对涉案青少年，防控策略不仅限于惩戒，更强调教育与社会支持相结合。各类援助组织，如“日本儿童社会工作协会（日本子ども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協会）¹⁹”“日本BBS联盟（日本BBS連盟）²⁰”持续开展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治支持工作。这些机构根据未成年人与青年犯罪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构建以咨询援助、心理疏导与法律引导为核心的干预机制，推动教育、感化与规制并重，促进其重返社会并有效预防再犯。

3.3.3 针对外国人犯罪的打击

伴随全球化与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跨国电信诈骗与网络犯罪在日本日益突出，网络诈骗与洗钱案件的受害规模持续上升。如何有效应对跨境犯罪、加强国际执法协作与境外追逃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日本已与国际刑警组织²¹、欧洲刑警组织亚洲犯罪信息网（ASEANAPOL）等国际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持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G7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执法合作。通过共享犯罪信息、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日本试图构建跨国犯罪联防联控体系。然而，受限于语言差异、法律体系不一、调查程序与执法权限不一致等因素，跨境协作在实践中仍面临显著障碍。这种不对称导致案件调查效率不高，难以实现执法标准与取证范围的统一。为提升合作效能，有必要完善相关数据库与通信基础设施，推动建立实时信息共享机制，并通过多边协商推动国际规则的标准化与制度化。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日本已初步构建了追踪境外逃犯的基本机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交换犯罪情报，联合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开展国际追捕行动，相关案件已取得一定进展。然而，引渡机制本身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国际引渡条约体系尚不完备；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间在引渡条件、司法标准、程序认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造成合作不畅。尤其在与新兴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诈骗、金融犯罪类案件的引渡安排仍显薄弱，亟需通过缔结或修订双边条约，明确引渡适用范围与条件，为打击跨境诈骗犯罪提供制度保障。

¹⁹ 日本子ども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協会、<https://www.jcsw.jp/philosophy.html>[2025-07-25]

²⁰ 日本BBS連盟、<https://www.jcsw.jp/philosophy.html>[2025-07-25]

²¹ 警察庁、<https://www.npa.go.jp/bureau/sosikihanzai/kokusaisousa.html>[2025-07-25]

3.4 针对重点人群的防范宣传评估

老年群体长期以来是特殊诈骗的主要受害对象。由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交圈相对封闭，老年人往往难以及时识别诈骗风险，易被犯罪分子锁定。尽管近年来该群体在受害者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仍处于高位——2023 年达 78.4%，2024 年为 65.4%。为应对这一问题，日本警方每年 10 月 11 日至 20 日开展“全国地区安全运动（全国地域安全運動）”，在辖区内由自治会、商店会、企业等组成“地区犯罪预防协会”，并联合“犯罪预防联络所”“犯罪预防指导员”、志愿者等力量，在社区广泛开展反诈宣传与入户走访²²。2024 年，该运动将特殊诈骗防范列为全国重点任务，通过邻里、家属等熟人渠道传播防骗信息，增强老年人获取帮助的可及性。同时，在固定电话通信和金融服务等关键端口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语音识别与风险模型实现诈骗行为的识别与预警，有效阻断高风险通话，并及时通知当事人及亲属。尽管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真正实现老年人免受诈骗侵害，仍需依靠家庭与社区整体的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家属与看护人员应积极分享最新诈骗形式，关注老年人情绪变化，帮助其建立防范意识，提高警觉性。

自 2018 年起，“ストップ・オレオレ詐欺 47”²³（SOS47）项目组联合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警方，围绕“オレオレ詐欺”等典型手法制作通俗易懂的科普材料，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提高公众识诈、防诈能力，取得积极成效。在此基础上，日本警方还推动跨部门协作，强化与银行、电信运营商、社交平台等主体的联动防控机制。例如，日本金融厅与警察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止未经授权使用储蓄账户（包括公司账户）的措施》（法人口座を含む預貯金口座の不正利用等防止に向けた対策の一層の強化について）²⁴，要求金融机构加强账户审查，向警方通报可疑交易。部分银行已与警方签署合作协议，在遇到涉嫌汇款诈骗时启动快速应对机制。通信企业也引入来电显示认证系统（固定電話の番号表示・非通知拒否サービス）²⁵，遏制号码伪造现象；同时开发具备 AI 识别功能的通话监测系统，对可疑通话实时分析、自动拦截。

考虑到固定电话在老年群体中的广泛使用，警察厅还与电话制造商合作，推出内置防诈骗功能的固定电话机（防犯機能付き電話の導入）²⁶。针对网络诈骗，日本政府要求社交平台配备具备日语及日本法规知识的审核人员，强化对广告投放的筛查，及时删除用于诈骗的信息，进一步压缩网络诈骗空间。

然而，当前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协作机制尚不完善。为进一步提升实效，有必要推动跨机构的实时信息共享系统建设，增强早期预警能力。例如，通信运营商与互联网平台可联合开

²² 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https://www.gov-online.go.jp/useful/article/201410/1.html>[2025-07-25]

²³ 警察庁、<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member/>[2025-07-25]

²⁴ 金融庁、<https://www.fsa.go.jp/news/r6/ginkou/20240823/20240823.pdf>[2025-07-25]

²⁵ 警察庁、<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service/>[2025-07-25]

²⁶ 警察庁、<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security-phone/>[2025-07-25]

发用户行为预警系统，在诈骗行为发生前发出风险提示。此外，面对不断演化的诈骗手段，相关机构亟需持续提升识别能力，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建动态更新的诈骗识别与快速响应机制。

四、日本特殊诈骗犯罪防控体系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在应对特殊诈骗犯罪方面，日本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强化行业监管与推动技术创新，逐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反诈法律框架。日本《刑法》第 246 条第一款界定了狭义的诈骗罪，即以欺骗手段使他人交付财物，并规定了获利型诈骗的处罚；第二款则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增设了“利用计算机实施诈骗罪”。此外，法律还对针对未成年人或心智障碍者的诈骗行为作出特别规定，设立“准诈骗罪”。

除《刑法》外，日本还出台了多项特别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诈骗形态。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個人情報保護法），明确企业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的法律义务，对信息泄露与滥用行为设定法律责任；《非法访问禁止法》（不正アクセス禁止法）严禁未经授权访问他人网络账户；《金融商品交易法》（金融商品取引法）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利用虚假陈述诱导交易，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特定商业交易法》（特定商取引に関する法律）的修订强化了对电话销售行为的规范，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罚款。政府还推行“电话记录留存制度”，以便在案件发生后提供关键证据。为减轻受害人经济损失，日本自 2008 年起实施《银行转账欺诈救济法》（振り込め詐欺救済法）。该法授权金融机构在发现疑似诈骗转账时冻结涉案账户，并在受害人申请后，依据账户余额和损失金额支付部分或全部赔偿，有效缓解诈骗对家庭造成的经济冲击。

相较之下，中国也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反诈法律体系。《刑法》第 266 条明确诈骗罪的构成与量刑标准，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第 287 条之二将为诈骗活动提供技术、支付或广告支持的行为定性为犯罪。《网络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从平台责任和用户信息保护角度出发，强化对网络诈骗行为的监管与打击。

2022 年 9 月，我国颁布首部专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并于当年 12 月起正式实施。该法明确电信、金融、互联网企业在防范诈骗中的主体责任，规范预警、打击、追责等全链条流程。2024 年 12 月 1 日，《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亦正式施行，作为《反诈法》的重要配套法规，进一步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

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可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一是细化诈骗罪分类，设立“准诈骗罪”条款，明确针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精神障碍者等）的犯罪行为的适用范围与量刑标准；二是在应对新型诈骗方面，可考虑设立涵盖 AI 技术等新手段的专门法条，提高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加强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法律追责，强化企业在信息

保护方面的法律义务。

此外，我国金融交易和电话销售领域相关法规相对分散，尚缺乏系统性规定。可参照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建立金融机构防诈责任清单，明确其在防范虚假宣传、赔偿机制及客户风险提示等方面的义务；推动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制定反诈自律规范，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管理。与此同时，还应健全资金追踪与快速冻结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间的协同联动，提升诈骗案件的反应效率与追赃能力。

4.2 创新防控机制

为应对“オレオレ詐欺”和网络钓鱼等新型诈骗手段，日本政府推动跨部门数据整合，由警方、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等联合构建实时防控机制。通过整合通话记录、金融交易、通讯行为等信息，能够提前识别存在诈骗风险的通话与交易，并迅速发出预警。大数据与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犯罪防控的重要技术支撑。尽管数据技术潜力巨大，但因个人隐私保护要求，数据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需要不断完善数据使用合规制度，通过增强信息安全保障、提高数据使用透明度并取得当事人同意等方式，推动数据驱动的反诈工作发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大数据在反诈工作中的应用。通信运营商基于庞大数据资源，积极研发和部署反诈产品。例如，中国电信推出的“翼平安反诈”云平台²⁷，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整合多方反诈数据与安全能力，构建了诈骗网址拦截系统、96110电话预警系统等核心模块；中国移动开发的“梧桐·反诈大数据”平台²⁸，支持公安机关快速追踪诈骗线索，并联合金融机构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实现对犯罪链条的精准打击。

在地方层面，广东省以“专业+机制+大数据”为导向构建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成效显著。例如，2024年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多地公安开展针对利用苹果FaceTime实施诈骗的专项行动，打掉诈骗团伙127个，抓获嫌疑人1056名²⁹；黔西南公安则通过“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合署办公机制，强化从“弱提醒”向“强阻断”转变的能力，显著提升止付挽损与风险防控效率³⁰。

未来，我国亟需推动公安、电信、金融等部门间的数据协同，建设统一高效的大数据反诈平台，实现涉诈数据的实时共享、精准研判和快速预警。通过引入先进人工智能与行为识别技术，可进一步增强平台的适应性与识别效率，应对诈骗手法的不断演变。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用于分析通话内容、识别可疑行为，并与互联网企业深度合作，提升诈骗识别与拦截能力。我国一直重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广泛部署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通话内容与行为特征分析，并结合互联网通信企业资源实现实时风险预警与自动拦截。

²⁷ 中国电信，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205766[2025-07-28]

²⁸ C114通信网， <https://www.c114.com.cn/news/118/a1245237.html>[2025-07-28]

²⁹ 广东省公安厅， http://gdga.gd.gov.cn/jwzx/jwyw/content/post_4498900.html[2025-07-28]

³⁰ 新华网贵州频道，

<http://www.gz.xinhuanet.com/20241113/576b245402d74a22b0cef94dc4b6bef9/c.html>[2025-07-28]

例如，温州公安部署 AI 通话识别平台，能在数分钟内完成诈骗识别并停机处理，识别准确率高达 95%；面对“AI 换脸拟声”等新型手段，中国电信依托大模型技术，推动多模态识别能力建设，建立技术防线³¹。企业端也在积极参与，如腾讯“守护者计划”、阿里“钱盾”平台已取得显著反诈成效；上海勤和研发的 IS 语音安全反欺诈系统集成成了监控研判、预警拦截、行为阻断和溯源追查等多项功能，用于打击通过 IS 语音等聊天软件实施的诈骗。³²

综上，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政企协同、数据驱动的智能反诈体系。未来仍需持续提升技术迭代能力，强化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反诈治理中的深度融合与常态化应用。

4.3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尽管中日两国在反电信诈骗宣传方面不断努力，但受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及公众反应差异的影响，两国在宣传策略的具体实施上仍存在显著区别。通过对日本宣传经验的考察可见，其在老年人教育、技术预警手段的引入以及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展现出多层次、精准化、协同化的宣传体系。这些经验为我国进一步优化反诈骗宣传策略提供了有益借鉴。

首先，我国在反诈宣传中亟需强化对不同群体特征的识别与区分，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教育措施。日本宣传重点集中于老年人群体，而我国在传统诈骗中老年人受害率较高，但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青年与中年群体成为新型诈骗的主要目标。不同年龄段、职业背景的群体在诈骗识别与防范意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老年人更易遭遇电话诈骗，而青年则更易遭遇网络平台上的虚假交易、投资陷阱等。

其次，为提高宣传触达率，需针对各类人群传播相应类型的典型诈骗案例，增强案例式教学的实际效力。例如，针对频繁使用电商平台的群体，应重点讲解冒充客服、物流类诈骗；针对学生家长及公司职员，可加强对冒充熟人、冒充领导类诈骗形式的识别教育；针对青少年，应提醒防范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当前，部分短视频平台上高质量反诈视频通过趣味性与专业性的融合，已实现数千万次播放，有效扩大了宣传影响力，激发了公众参与意识。我国可进一步整合线上与线下宣传渠道，如社区公告栏、微信群、短视频平台、互动课堂等，构建立体化、多元化宣传体系，提升覆盖面和渗透力。

此外，青少年因社会经验不足、辨别力弱，在遭遇诈骗时易出现情绪波动与行为冲动，带来心理乃至生命安全风险。目前对中小学生的保护以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人身安全为主，对诈骗等潜在风险防范力度不足。近年来政府在中小学逐步推广反诈骗教育，组织开展“反诈进校园”等活动，取得初步成效，但整体尚缺乏系统性、组织性与规模性。为此，应充分利用“安全教育日”“法治教育周”等时间节点，推动校园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将防骗意

³¹ 浙江在线，https://cs.zjol.com.cn/jms/202409/t20240926_30548582.shtml[2025-07-28]

³² 上观新闻，<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52946623283364404/>[2025-07-28]

识内化于学生认知体系，切实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在日本经验中，社区与公益组织在宣传体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居民间联系弱化的问题，我国亦应发挥基层组织作用，落实居委会、社区民警等职责任务，构建横向联动与纵向传导兼具的宣传机制。同时，应加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与志愿者协会、行业协会形成联动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全民反诈格局。

4.4 加强国际合作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中日两国均高度重视国际合作，积极推动执法协作机制建设、司法协助体系完善及反诈经验的跨国交流。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理负责人霍夫曼指出，电信诈骗已成为全球性威胁，其在受害人数、波及范围与涉案金额方面均持续上升。据估算，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每年因电信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00 亿至 400 亿美元³³。

面对跨国诈骗的蔓延趋势，中日两国均致力于构建高效的跨境执法协作网络。2022 年 3 月至 6 月，我国与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开展“曙光行动”，协调 76 个成员国警方捣毁诈骗窝点 1770 个，抓捕犯罪嫌疑人 2000 余人，拦截非法资金超过 5000 万美元。我国与东盟国家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建立了系统性合作框架，特别是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电诈打击成为双边与多边合作的重点议题。自 2023 年中缅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以来，2024 年联合摧毁了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拔除多个大规模电诈窝点³⁴。2 澜湄执法合作中心于 2024 年 8 月至 12 月组织实施“海鸥”联合执法行动，协调中、柬、老、缅、泰、越六国执法部门联合打击电信诈骗及其衍生犯罪（如枪支弹药走私等），实现了区域执法力量的集中整合³⁵。未来，我国需要建立更广泛的情报共享平台，与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周边国家共享诈骗情报、犯罪趋势和实践案例。

我国持续深化区域执法合作，推进电诈全链条治理。我国与东南亚司法合作密切，例如自 2018 年以来，我国与柬埔寨等国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打击跨境赌博与电信网络诈骗取得实质成效，建立了跨境联合执法机制。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我国已与 86 个国家签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截至 2023 年 8 月，我国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共 60 项，涵盖我国大部分周边邻国、拉美主要大国、部分非洲国家和有关欧洲国家。³⁶ 下一步，我国需在国际合作框架内进一步简化引渡程序、提高协作效率，增强跨国追责与执法能力。

在反诈经验交流方面，我国积极借助国际会议和多边机制分享实践成果。2024 年 10 月，

³³ 新华网，<https://www.news.cn/legal/20250217/920fef48e4a34049a8d07e0e0321d8df/c.html>[2025-07-29]

³⁴ 张晨：《连根拔除窝点 彻底查清真相 公安机关侦办缅北明家犯罪集团案件实录》，《法制日报》2024 年 12 月 31 日

³⁵ 央视新闻，<https://news.cctv.com/2025/01/21/ARTIZZ9ZRxwRKEu0AP1xKI8J250121.shtml>[2025-07-29]

³⁶ 吴琼：《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 30 年来成绩斐然》，法治日报环球法治 2023 年 9 月 4 日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联合声明》，倡议深化执法合作、推进经验共享与机制对接。我国在与东盟国家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仍存在提升空间。未来，应继续通过多边平台加强技术合作、推动法律标准协调、强化信息通报机制，构建开放高效的国际反诈协作体系。作为地理相近、受害特征相似的国家，中日两国在应对跨境诈骗方面具备高度合作潜力。加强双边执法联动与信息共享，将有助于提升区域打击能力，维护两国公民的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跨国诈骗的治理必须依赖国际合作形成合力，唯有如此，方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全球扩散趋势。

五、 总结

本文基于 2019-2024 年日本特殊诈骗犯罪的数据与治理实践，系统揭示了其“技术驱动扩散、弱势群体聚焦、国际化网络深化”的三角演进模式。

研究发现，显示规模性扩张趋势；地理分布呈现由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同时部分低发区域出现高额单笔损失；诈骗手段则由传统电话向网络化、智能化转型，AI 拟声、社交平台引流及加密货币洗钱使跨境性与隐蔽性显著增强。同时，社会脆弱性凸显，如老龄化与代际数字鸿沟、独居与情感隔离、以及医疗信息泄露，成为犯罪得以渗透的重要条件。65 岁以上群体，尤其是老年女性，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受害概率远高于其他群体，反映技术防控之外的社会治理短板。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地区，在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进程、跨境诈骗等问题上具有显著共性，电信诈骗的治理面临相似挑战，近年来，两国皆深受跨境诈骗侵扰，且主要犯罪团伙多活跃于东南亚一带，形成治理的空间可比性与经验机制的可移植性。因此，对日本治理经验的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更为中国在全球打击网络诈骗的多边博弈中提供了制度创新思路，也为构建具有区域韧性的东亚反诈合作机制指明了方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中国有以下四点启示：

首先，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需同步展开。面对 AI 语音合成、数字换脸、跨境转账等新型电信诈骗行为，我国在已有法律框架（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基础上，可进一步细化相关条款，例如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等重点受害群体设立更具操作性的“加重处罚条款”；对涉境外主体犯罪、非法数据贩运、深度伪造图像技术等行为设立专章规制，以提升打击精度与司法适配力。

其次，机制协同与技术创新应深度融合。日本近年来推动“警-银-网-技”一体化合作，构建了以 AI 为核心的诈骗识别预警网络。我国可借鉴其“情报集成+即时拦截”模式，在公安、通信、金融等部门之间建立数据共享中枢，推动技术平台联防，完善风险号码识别、异常交易监控、通话行为分析等环节的实战部署，实现事前识别、事中阻断、事后溯源的完整闭环。

第三，执法打击与宣传教育需并重。日本“SOS47 项目”通过娱乐化、社群化的手段将

反诈信息传达至高风险群体，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国可结合地方社区、学校、媒体平台资源，在反诈宣传中注重“因人施策”，如面向老年人推出可视化、语音化教育工具，针对青少年打造游戏化反诈互动系统，推动防骗理念真正渗透至家庭、社群与学校。

第四，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需同步升级。日本通过与 G7、东盟等国家的跨境追逃、信息共享与引渡合作，在应对跨国诈骗方面取得了制度性进展。我国近年来虽在与东南亚国家反诈合作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果（如打击缅北诈骗团伙），但在多边标准制定、技术同步响应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可深化与国际刑警组织、APEC、东盟 POL 等组织的机制化对接，强化技术情报的双向共享与联合行动的快速响应。

参考文献

- [1] 総務省「令和6年通信利用動向調査の結果」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statistics/data/250530_1.pdf [2025-08-10]
- [2] 警察庁「令和6年における特殊詐欺及びSNS型投資・ロマンス詐欺の認知・検挙状況等について（確定値版）」
https://www.npa.go.jp/bureau/criminal/souni/tokusyusagi/hurikomesagi_toukei2024.pdf [2025-08-10]
- [3] 警察庁「令和6年の犯罪情勢」
https://www.npa.go.jp/publications/statistics/kikakubunseki/r6_jyosei.pdf [2025-08-10]
- [4] 张晨：《连根拔除窝点 彻底查清真相 公安机关侦办缅北明家犯罪集团案件实录》，《法制日报》2024年12月31日
- [5] 警察庁「令和6年全国地域安全運動等の実施について」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sei/anki55/news/doc/20240919.pdf> [2025-08-10]
- [6] 警察庁「令和5年度実績評価書」
https://www.npa.go.jp/policies/evaluation/04jigohyouka/jisseki_hyouka/r6_jissekihyoka.pdf [2025-08-10]
- [7] 朱玥颖：《日本网络犯罪事件增多》人民日报 2024年8月7日
- [8] 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国民を詐欺から守るための総合対策」、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hanzai/kettei/240618/honbun.pdf> [2025-08-10]
- [9] こども家庭庁「令和6年度『青少年の非行・被害防止全国強調月間』実施要綱」
https://www.cfa.go.jp/assets/contents/node/basic_page/field_ref_resources/a6546e3b-4ff3-421f-b2aa-24a82f2efe6c/cddb266d/20240612_policies_youth-kankyohikouhigai-gekkann_09.pdf [2025-08-10]
- [10] 警察庁「令和5年における組織犯罪の情勢【確定値版】」
<https://www.npa.go.jp/publications/statistics/kikakubunseki/r5jousei20240408.pdf> [2025-08-10]
- [11] 警察庁「警戒の空白を生じさせないために当面取り組むべき組織運営上の重点について（通達）」
<https://www.npa.go.jp/laws/notification/0703jyuuten.pdf> [2025-08-10]
- [12] 内閣府「令和4年度 高齢者の健康に関する調査結果（全体版）」
<https://www8.cao.go.jp/kourei/ishiki/r04/html/index.html> [2025-08-10]

- [13] 警察庁 令和1～5年における特殊詐欺の認知・検挙状況等について（確定値版）
<https://www.npa.go.jp/publications/statistics/sousa/sagi.html> [2025-08-10]
- [14] 法務省 令和2～6年版犯罪白書
https://www.moj.go.jp/housouken/houso_hakusho2.html [2025-08-10]
- [15] The Japan times “Gold bullion scams targeting elderly people on the rise in Japan”,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08/26/japan/crime_legal/gold-bar-fraud/ [2025-08-10]
- [16] 新华网《专访 | 中国推动地区打击跨境电诈合作令人鼓舞——访联合国毒品罪办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理负责人霍夫曼》
<https://www.news.cn/legal/20250217/920fef48e4a34049a8d07e0e0321d8df/c.html> [2025-07-29]
- [17] 央视新闻《澜湄合作打击电诈！“海鸥”联合行动共逮捕犯罪嫌疑人7万余名》，
<https://news.cctv.com/2025/01/21/ARTIZZ9ZRxwRKEu0AP1xKI8J250121.shtml> [2025-07-29]
- [18] 中国电信《数实融合优秀案例 | 反诈也有“科技与狠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205766 [2025-07-28]
- [19] C114 通信网《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中国移动正式发布三款梧桐大数据产品》，
<https://www.c114.com.cn/news/118/a1245237.html> [2025-07-28]
- [20]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公安厅公布打击利用 FaceTime 实施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http://gdga.gd.gov.cn/jwzx/jwyw/content/post_4498900.html [2025-07-28]
- [21] 新华网贵州频道《黔西南州“警银通”三方联动 共筑反诈防线》，
<http://www.gz.xinhuanet.com/20241113/576b245402d74a22b0cef94dc4b6bef9/c.html> [2025-07-28]
- [22] 浙江在线《中国电信温州分公司以“AI+反诈”助力打击通信网络诈骗》，
https://cs.zjol.com.cn/jms/202409/t20240926_30548582.shtml [2025-07-28]
- [23] 日本子ども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協会「日本子どもソーシャルワーク協会とは」、
<https://www.jcsw.jp/philosophy.html> [2025-07-25]
- [24] 日本BBS連盟「BBSとは」、<https://www.jcsw.jp/philosophy.html> [2025-07-25]
- [25] 警察庁「国際犯罪対策」、
<https://www.npa.go.jp/bureau/sosikihanzai/kokusaisousa.html> [2025-07-25]
- [26] 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全国地域安全運動 / 安全安心なまちづくりの日 みんなでつくろう安心の街」、
<https://www.govonline.go.jp/useful/article/201410/1.html> [2025-07-25]
- [27] 警察庁「SOS47の活動」<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member/> [2025-07-25]
- [28] DOCOMO「迷惑電話ストップサービス」、
https://www.docomo.ne.jp/binary/pdf/internet/hikari/tell_service/support/notice_08.pdf [2025-07-24]
- [29] The Mainichi “Japan police agency aims to use AI to identify phishing sites”,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40321/p2a/00m/0na/003000c> [2025-07-24]
- [30] NHK「万博偽サイト確認 注意を チケット販売サイト装い個人情報詐取」、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50328/k10014762881000.html> [2025-07-24]
- [31] 警察庁「警察庁・SOS47 特殊詐欺対策ページ」、
<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 [2025-07-24]

[32] 金融庁「法人口座を含む預貯金口座の不正利用等防止に向けた対策の一層の強化について(要請)」、
<https://www.fsa.go.jp/news/r6/ginkou/20240823/20240823.pdf> [2025-07-25]

[33] 警察庁「固定電話の番号表示・非通知拒否サービス」、
<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service/> [2025-07-25]

[34] 警察庁「防犯機能付き電話の導入」、
<https://www.npa.go.jp/bureau/safetylife/sos47/case/security-phone/2025-07-25>

[35] 千葉県「STOP! 電話 de 詐欺」、<https://www.pref.chiba.lg.jp/seikouan/bouhan/anzen/stopddsagi.html> [2025 07 24]

[36] Biz clip「なぜだまされる? 『特殊詐欺』を食い止める方法」、<https://business.nttwest.co.jp/bizclip/articles/bcl00154-047.html> [2025-07-24]

[37] TBS news「特殊詐欺事件捜査体制拡充へ「特殊詐欺連合捜査班」＝通称、TAIT を新設 警視庁、大阪など7都府県には専従捜査員500人」、
<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891533> [2025-07-24]

[38] 警視庁特殊詐欺対策本部「『特殊詐欺根絶アクションプログラム・東京』とは」、
<https://action.digipolice.jp/actionprogram> [2025-07-24]

[39] 岩手県警察「広報啓発活動の紹介」、
<https://www.pref.iwate.jp/kenkei/anzen/sagi/3001952.html> [2025-07-24]

[40] OHK 岡山放送「若い世代の発信力で特殊詐欺被害防止! 岡山市で日頃から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行う中高生が広報活動【岡山】」https://www.ohk.co.jp/data/26_20240820_00000008/pages/ [2025-07-24]

[41] 新浪财经《日本“怪象”! 投资诈骗激增7倍! 》,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zqgd/20240520/doc_inavxaph7568406.shtml [2025-07-23]

[42] 朝日新聞「特殊詐欺でIP電話の悪用相次ぐ 簡単に回線転売、甘い身元確認」、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CK7H9BPCKTIPE013.html> [2025-07-23]

[43] 人民网《日本假冒名人的诈骗案大增 老年人最容易受骗》,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4/0605/c35421-40251169.html> [2025-07-23]

Risk Governance of Telecom Fraud: Lessons from Japan for China

Hou Yingying Lyu Ruoshui, Chu Mingyang

(Nankai University, Nankai,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is study reveals a triangular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pecial fraud crimes in Japan during 2019–2024,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driven diffusion, victimiz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national criminal network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cale of special fraud in Japan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with the average daily financial loss rising sharply. Emerging techniques, such as pop-up fraud and cross-border remittance fraud,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share. Elderly individuals—particularly elderly women—remain the primary victim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fraud networks is complex, with domestic youth, transnational intermediaries, and organized crime groups each playing distinct roles. In the face of rapidly evolving fraud techniques, fragmented prevention systems, and pronounced social vulnerabilities, conducting systematic research hold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Drawing on Japan’s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logic of fraud evolution and the pathway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telecom fraud governance.

Keywords: special fraud; Japan’s telecom fraud governance; digital anti-fraud technologies; transnational crimin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